

苏轼诗文可证道——江谦《东坡禅学诗文要解》的编注理念及其价值

潘婷^{1*}

(^{1*}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一九四七年, 上海佛学书局出版的《东坡禅学诗文要解》是一部十分独特的诗文选本。该书对苏轼涉佛诗文进行选注, 或揭示原文之佛理、或批评原文之不合, 展现出引导读者借由苏轼诗文“见佛”“启信”的编注理念。而将苏轼诗文视为入道门径, 与苏轼的个人身份、苏轼诗文的特征和儒佛同宏的理念密切相关。总体来看, 这部诗文选本可以说是对近现代时期“儒佛并重”的“人间佛教”思潮的一种回应。

关键词: 苏轼; 东坡禅学诗文要解; 江谦; 儒佛同宏; 人间佛教

The poetry and prose of Su Shi can prove the truth: The selection concept and value of Jiang Qian's "An Ess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Sushi's Zen Poetry and Prose"

Pan Ting^{1*}

(^{1*}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Essential Explanations of Sushi's Zen Poetry and Prose published by Shanghai Buddhist Publishing House was a very unique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prose. This book selects and annotates Su Shi's Buddhist poems and essays, either revealing the Buddhist doctrines of the original texts or criticizing their imperfections, demonstrating the concept of compiling and annotating to guide readers to "see the Buddha" and "inspire faith" through Su Shi's poems and essays. Regarding Su Shi's poetry and prose as the gateway to enlighten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Su Shi's personal ident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etry and prose, and the concept of the coexist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Overall, this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prose can be regarded as a response to the "Humanistic Buddhism" trend of "equal emphasis o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Keywords: Su Shi; An Ess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Sushi's Zen Poetry and Prose; Jiang Qian; Equal emphasis o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Humanistic Buddhism.

引言

作为有宋一代杰出的诗文书画大家, 苏轼及其文艺作品一直备受瞩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苏轼深谙儒、释、道三家学说, 尤其是佛学的影响时常浮现于笔端。历代文人对此多有评述, 且不乏将其涉佛诗文汇编成集者。一九四七年, 上海佛学书局出版、江谦(1876-1942)署名的《东坡禅学诗文要解》便是个中代表。与一般诗文选本不同, 该书编选与注解的目的并非指导诗文创作, 而是为了引导读者通过苏轼诗文领略佛学精髓, 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以诗文证道”的特色。此外, 书中大量评语还透露出“儒佛同宏”的深层次考量, 可以说是对近现代时期“人间佛教”思想的回应, 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

- 87 -

作者简介: 潘婷(1994-), 女, 湖南岳阳, 博士, 研究方向: 美术史论

通信作者: 潘婷, 通信邮箱: Panting1521186578@163.com

www.shiharr.com

1. 编选旨趣：收拾儒禅归净土

目前所见《东坡禅学诗文要解》，由上海佛学书局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出版。关于该书的责任者，版权页明确写作“著者江谦，编辑校订者齐用修、游有维”，似乎并无讨论的必要。但根据《东坡禅学诗文要解》的序跋、题词、注解来看，该书的编纂过程实际上颇为复杂，且前后历经十余年方才正式出版。

具体来看，该书的选文部分由齐用修遵照其师江谦的嘱托辑录而成，江谦曾说“坡公尝谓‘我因学佛而后知儒’，不慧则因读紫柏集而后知坡公之深于佛也，故属用修居士录为是编，以饷世之因好公诗文而见佛者”^{[1]42-43}。齐用修（1901—1938），名朝章，法名慧懋，自号乐净子，又号素心道人，是安徽婺源县（今属江西上饶）齐若农居士的儿子。他生性恬静好学，1928年受聘于婺东江湾小学，从而跟随江谦学习并获闻佛法，随即研读佛书，持斋念佛，不曾稍有间断^[2]。据其本人《东坡禅学诗文要解序》可知，他早年曾学习古文并独好欧、苏，认为苏轼之文“禅机透露，语语上乘”，因而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利用公事之余编成此书。至于选录苏轼诗文的标准，他则说：“世人玩其文、遗其意，选其诗文者，大都取其论世畅游诸作，而其毕生归心赞佛诗文，有至老而尚不知者。东坡于佛造诣之深，非小子所能知，谨掇辑其诗文之发明心性与称扬赞叹诸佛菩萨者若干首，而请阳复师于难解处加注语，以为好读坡公诗文而未通佛理者启信。”^[1]

其中据选文来看，“赞叹诸佛者”主要包括偈、颂、赞等文体，如《阿弥陀佛赞》《释迦文佛颂》《灵感观音偈》等；“发明心性者”则涉及诗、记、跋等文体，如《赠东林总长老》《黄州安国寺记》《书楞伽经后》等；两类诗文共计九十五首。至于编选此书的目的，则是为了让喜读苏轼诗文之人能够由此“见佛”“启信”，也就是将苏轼的作品视为学佛之门径。

根据《东坡禅学诗文要解跋》可知，齐用修编成此书后，交由其师江谦添加注语，即当前所见“要解”部分。其后因遭逢战乱，该书书稿被江谦另一弟子游有维携归深山。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齐用修又写信嘱托游有维补录《前赤壁赋》一篇，并再次将书稿交给江谦添加按语。此外，游有维还从《宋稗类钞》中摘录苏轼与佛印禅师的两则故事，同样附有江谦所撰“要解”，可知游氏在校订此书过程中当与其师交流颇多。而就江谦“要解”来看，如《观音赞》的“要解”称“读此赞者，当知天台六即之义……苏公此赞，教人知观世音非他，即自性之大悲菩萨也”^{[1]6}，同样是将苏轼诗文视为入道门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游有维曾为此书撰写跋语讲述成书原委，江谦则作有《自题》诗十三首来阐述其佛学理念及诗文见解。至此书出版时，又有圆瑛法师撰写《题词》以及蒋维乔居士题写书名。

近现代时期，佛教诸宗，皆归净土。上述圆瑛法师就是禅净双修的代表，江谦同样在此书开篇第一条要解中称“深入念佛三昧，一念念佛，一念生西，则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1]1}。很显然，江谦将苏轼诗文视为学佛门径，而其指归在于禅净双修、往生极乐，“永明大师所谓‘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者，可不惧哉！佛儒一贯，禅净双修，圣人复起，不易斯言”^{[1]47}。不仅如此，游有维所作《校订〈东坡禅学诗文要解〉后谨赋》也曾说“收拾儒禅归净土，一心六字是慈航”^{[1]50}。此一心者，即禅宗常说的自心本性；六字者，为净土念佛法门的“南无阿弥陀佛”真言。总之，这部苏轼诗文选本的编选理念是“以诗文证道”，而所证之“道”则是儒佛一贯之道，是禅净双修之道。

2. 以禅解文：禅学诗文成水乳

正如圆瑛法师为该书所作《题词》中说的那样，“禅学诗文成水乳，诗文禅学岂藤萝”^{[1]2}，苏轼的涉佛诗文处处闪烁着禅学的智慧。据笔者统计，江谦为苏轼诗文所作“要解”五十九条，加上自题诗、像赞按语等，共计一百余条。这些要解大都站在佛教立场，很好地揭示出苏轼诗文中蕴含的佛禅理念，如《书〈金光明经〉后》的要解所说：“大小虚实，唯是一心。末后一段，真转经龙象。”^{[1]34}“转经”即唱诵佛经，他认为苏轼诗文就是对佛教经典的绝佳解读。具体来看，江谦为苏轼诗文所作注解除了解出处、注字词外，在揭示佛禅理念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将苏轼诗文中蕴含的佛学理念阐说明白。如苏轼《油水颂》说：“水在油中，见火则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安，内外净故。若不经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见火复起。”^{[3]596}此颂为观佛牙而作，并以“水”“油”“火”为譬，显然蕴含着丰富的佛禅

思想,但具体内涵却并未明言。江谦的要解则说:“‘油譬’则性也,‘水譬’则情也,‘火譬’则色、声、香、味、触、法之境缘也。‘起’谓贪、嗔、痴之三毒,‘不知有火’谓照见五蕴皆空。内不见心,外不见境,故内外俱净。”^{[1]21-22}他不仅明确点出“水”“油”“火”所譬为何,还认为只有经过火(也就是外缘)的锤炼,才能够去情尘、存真性,达到真正的“定”的境界,从而将苏轼文章中的隐微之处阐说明白。又如《胜相院经藏记》中有“见山不见宝”“见宝不见山”“如以蜜说甜”“复以甜说蜜”^{[3]389}之语,江谦所作要解则说“见山不见宝,喻见相遗性;见宝不见山,喻见性遗相;二者皆边见也。即相明性,是谓以蜜说甜;即性明相,是谓以甜说蜜。一大藏经,皆如此说”^{[1]41}。很显然,江谦这些注解将苏轼诗文中的佛禅理念解释的更为详晰,从而为借由苏轼诗文见佛者提供了极大帮助。另外,江谦还指出苏轼文章中的“闻思修王”为观音菩萨(见《静安县君许氏绣观音赞》)、苏轼诗歌中的“长不死”即无生无灭等(见《金山妙高台》),也都发前人所未发。

其次,于苏轼欲言又止处以代语、别语作答。代语、别语原本是宋代“文字禅”的表现形态,所谓“未尽善者,请以代之;语不格者,请以别之”^[4]。“代语”主要用于补充禅宗公案中未予作答的提问,“别语”则是对禅宗公案中已有的答语另作新解。江谦对苏轼诗文的要解同样如此。先看代语,苏轼《东坡羹颂》曾说:“甘苦常从极处回,咸酸未必是盐梅。问师此个天真味,根上来么尘上来?”^{[3]595}“根”者,眼、耳、鼻、舌、身、意也;“尘”者,色、声、香、味、触、法也。苏轼此文末句问羹汤味从何而来,但并未作答,江谦则以代语答道:“非根上来,非尘上来。根尘识三,因缘和合,虚妄而生也。因缘别离,亦虚妄而灭。”^{[1]21}这里用“因缘法”回答苏轼的“根”“尘”之问,是对佛教世界观的运用。再看别语,苏轼《阿弥陀佛赞》说“丈六全身不为大,方寸千佛夫岂小。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便到无魔饶”^{[3]619},江谦认为末二句有所不妥(不格),并将其改为“此心平处见西方,一念便到无魔饶”^{[1]2}。“见”者,以空慧彻见之意也,较“是”为佳。“平”者,莲池祿宏所谓“理一心”也,“心平”则此心与净土不二,故而改“闭眼”作“一念”实为“净即是禅”^{[1]3}理念的直接反映。江谦这种将前人文章改动数字后,再收入所编选本中的作法十分罕见,其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轼诗文宣扬佛学理念。总的来说,江谦采用宋代禅僧解读公案的手段注解苏轼诗文,其实是把苏轼作品视为禅学文本,从而赋予了其宗教意义上的典范性。

第三,对苏轼诗文中不合佛法之处进行批评。此书所选苏轼诗文最为知名者当属《赤壁赋》,但江谦的注解却并非是加以褒扬。他说“此文诵者多矣,而于其谈禅处,多未能解。水之逝者,相也;而未尝往者,不动之性也。月之盈虚者,相也;而卒莫消长者,本来圆满之性也……性虽不生不灭,然若不能修净土、出轮回,则生死无尽、沉溺可悲……此赋是坡公黄州始悟道时所作,故戒根未净”^{[1]47},这里是从“性相不二”视角对“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物与我皆无尽也”等语句加以注解,至于批评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认为苏轼“不能修净土”,不修净土则难出轮回、生死无尽;二是批评苏轼“戒根未净”,此语大约是针对“肴核既尽,杯盘狼藉”而发。总之,江谦在“儒佛同宏”“禅净合一”的立场下对苏轼诗文中的佛禅理念加以揭示,这种将苏轼作品视为禅学文本的方法,在具体解说中新见迭出。

此外,江谦还常常借助苏轼诗文来说明自己的佛教观念。如苏轼《荔枝并序》提到借地种菜之事,江谦则藉此指出“杀生食肉为恶之首”^{[1]28};《四菩萨阁记》提到施舍吴道子画之事,江谦则认为此文“发人深省,可以劝舍”^{[1]39},等等。并且,该书选入《阿弥陀佛颂》《释迦文佛颂》《东坡羹颂》《油水颂》等文,而对于同样蕴含佛理的《禅戏颂》《桂酒颂》《猪肉颂》等作品却视而不见,自然也不乏弘法布道的考量。

3. 诗文合道:儒佛鼻孔东坡公

在认识到《东坡禅学诗文要解》的编选旨趣和注解策略后,还需要思考的是,江谦、齐用修、游有维等人为什么要选择苏轼诗文作为引人入道的手段?这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苏轼本人的身份。在书前第十一首《自题》诗中,江谦曾说“坡公宿世老禅师,赞叹殷勤紫柏师。儒佛一般般若海,印心一卷永传之”^{[1]3}。所谓“宿世老禅师”,指的是苏轼往往被视为五祖戒禅师的化身。据《冷斋夜话》记载,“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

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岁矣。”^[5]在佛禅世界里，苏轼的前世是一位僧人，而此世同样也是开悟者。如江谦在《黄州安国寺记》的要解中说“坡公悟道，始自黄州，其夙根由来久矣”^{[1]38}，前引《前赤壁赋》的要解也有“黄州始悟道时所作”^{[1]47}之语。换句话说，前世为僧、今生悟道的身份让苏轼成为首选之人。

第二，苏轼诗文的特征。苏轼早年就已名满天下，科举及第后，欧阳修曾有“吾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6]之语。苏轼文章更是风行天下，甚至不乏“宇宙第一文字”^[7]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苏轼的涉佛诗文进行解读，必然有助于佛禅理念的广泛传播。并且，《东坡禅学诗文要解》所选苏文中，确实存在很多阐说佛理之作，如《阿弥陀佛颂》中的“唯心净土”思想、《水陆法像赞》中的“事理障”“断灭相”理念、《六观堂赞》中“由假入空”的修行路径等。又比如《僧伽赞》说“麻田供养东坡赞，见者无数悉成佛”^{[3]619}，很显然，苏轼本人也认为自己的诗文可以引人入道。再比如《朱寿昌梁武忏赞偈》说“梁武所说忏悔，文既繁重，旨亦渊秘，一切众生，有不能了。乃以韵语，谐诸音律，使一切人，歌咏赞叹，获福无量”^{[3]643}，苏轼具有以“协律”之文助人祈福的创作旨趣。如此一来，选择苏轼诗文来引人入道也就水到渠成。

第三，儒佛同宏的理念。这本《东坡禅学诗文要解》被收入江谦所编“阳复斋丛刊”，属于十七种单行本的第三种，其他尚有《灵峰儒释一宗论》《儒佛合一救劫编》《佛儒经颂》《儒佛一宗主要课讲义》等，也都是将“儒佛合一”作为主导理念。实际上，江谦晚年曾创办“佛儒合一研究会”（后改名“灵峰学社”），“儒佛合一”正是他以佛学救亡图存的思想核心^[8]。具体到书中评语来看，《南安军常乐院新作经藏铭》的注解“前有坡公，后有灵峰，儒佛鼻孔，一气融通”^{[1]31}，《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序》的注解“公与弟子由皆湛深儒佛，发为文章，光照百世，其渊源有自来也。元明清科举，偏重程朱学说，故佛儒分裂。若苏氏之学早行于世，则佛儒之合久矣”^{[1]29}。很显然，江谦在“儒佛合一”理念下更倾向于选择儒家士大夫而非僧人能文者作为入道之门径，而苏轼文章正是这样一个绝佳范本。

综上，江谦等人编注《东坡禅学诗文要解》实际上是对“儒佛同宏”思想的一种践行，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弘扬“儒佛合一”的理念和引人入道。这种站在佛教立场注解苏轼诗文的做法，相当于是将苏轼诗文混同于禅学文本，不仅在注解中多有新见，也为诗文选本的考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更进一步地看，所谓“儒佛二教，合之双美，离之两伤”^[9]，所谓“若苏氏之学早行于世，则佛儒之合久矣”^{[1]29}，这种编注理念与注解方式还可以视为对近现代时期“儒佛并重”的“人间佛教”思潮的一种回应。

参考文献：

- [1] 江谦.东坡禅学诗文要解[M].上海:上海佛学书局,1947.
- [2] 梅□氏.齐用修居士行述与生西纪实[J].佛学半月刊 1939(191):2.
- [3]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 [宋]楚圆集.汾阳无德禅师语录//佛光大藏经·禅藏第24册[M].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159.
- [5] [宋]释惠洪著,周萌笺注.冷斋夜话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397.
- [6]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1:2459.
- [7]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1093.
- [8] 赵娟.江谦研究[D].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240.
- [9] 印光法师.印光大师全集第二册[M].台北:佛教出版社,1991:325.

（栏目主编：侯本塔 编辑：韩文涛 校对：金宇恒）